



中国学术批评书系

意识形态与百年文学

武新军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学术批评书系

意识形态与百年文学

武新军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识形态与百年文学/武新军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1. 6
(中国学术批评书系)

ISBN 978-7-5649-0446-3

I. ①意… II. ①武…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意识形态—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9033 号

责任编辑 谢景和

责任校对 谢 廓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90mm×980mm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365 千字 定 价 47.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上编 意识形态与文学史

意识形态与中国现代文学史	(3)
意识形态结构与中国当代文学	(15)
五四新文学与革命文学关系考	(29)
新文学发轫期的文学古典化诉求	(45)
延安文学的“现代性”与民族化、大众化实践	(65)
国统区两种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对抗	(75)
十七年文学研究的三个误区	(91)
文学史研究“当代化”与“历史化”	(99)
20 世纪文学史研究中的两个评价体系	(108)
重审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	(113)
近十年女性文学研究思路批判	(132)
反抗异化的执著探寻	(143)
史料的挖掘与历史的阐释	(166)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173)
学术研究的历史意识与当代意识	(179)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185)

下编 小说中的意识形态

绪论：当代小说中的意识形态	(199)
意识形态与小说中的革命史	(210)
近三十年小说中的“城”与“乡”	(224)

重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244)
生不逢时的《三家巷》	(255)
建构多民族统一国家想象	(268)
通俗与革命的融合与龃龉	(280)
在爱情与政治的纠缠中成长	(292)
模范英雄的诞生	(304)
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困境	(316)
多维空间中的人性探索	(328)
启蒙困境艰难反思	(336)
内在焦虑的衍变	(344)
反腐倡廉小说指瑕	(351)
《暗算》:茅盾文学奖的突破还是悲哀	(361)
如何面对小说的危机	(369)
后记	(378)

上编

意识形态与文学史

意识形态与中国现代文学史

一 意识形态的转化与现代文学史观的变化

意识形态的转化,常以重大政治事件为其开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这两个重要政治事件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我们可以发现:从新中国成立前到新中国成立后,从改革前到改革后,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经历了一个从多元到一元再到多元,政治性因素由弱到强再到弱,文学性因素由强到弱再到强的变化历程。这些变化都与意识形态的转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前,无论是三民主义、马列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未能在思想界取得绝对支配地位。受此影响,当时的现代文学史观还没有定于一尊:既有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等受到唯物史观影响的文学史著,也有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等依循学术思潮的传承演变轨迹而撰写的文学史著。任访秋、伍启元的主要兴趣在学术而不在政治,由于较少受到政治斗争的干扰,他们基本上能够对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等量齐观,甚至能够从“资产阶级”(自由人、第三种人)立场出发,尖锐批评“无产阶级文学”的缺陷(如伍启元)。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文学史著相比,这些酝酿期的文学史著具有较强的文学意识和色彩,最明显的首推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该著以文学的自身发展作为描述和考察的主要对象,从文体角度描述新文学发展的历程,更多关注的是新文学中各类文体的发展状况,而绝少令人窒息的政治话语。即便是周扬的《讲义提纲》,对新文学的发展道路也基本秉

持客观的态度,对文学的热情尚未被政治的激情淹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成为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工具,其政治性因素被大大强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现代文学史写作的主导思想。1951年,老舍、王瑶、张毕来、蔡仪、李何林等人应教育部要求拟定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明确规定:新文学不是“白话文学”、“国语文学”、“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这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史家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标准建构文学史的愿望。需要指出的是,同样是以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为指导思想,但不同的文学史家却有不同侧重点:王瑶显然看重的是“反帝反封建”几个字,在受到批判后,他曾检讨说:“在我的书里,根本看不到对于社会主义因素的任何重视,而只是片面强调反帝反封建的性质。……我虽然也谈党对文学战线领导的逐渐加强和巩固,但我只重在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方面,而忽略了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方面。”〔1〕他承认自己混淆了“革命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把二者统称为“新民主主义的,反帝反封建的”,“那结果就使得现代文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非常模糊,使读者看不清楚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和党的领导作用了”。〔2〕在政治性与文学性之间,王瑶明显偏重于文学性,吴组缃、杨晦、钟敬文等人曾批评他重视艺术性而思想性不强的缺陷〔3〕。对此,他本人也是承认的:“对于一篇作品的分析,我最先注意的常常是人物性格是否鲜明,结构是否完整,以及是否具有独特的风格等等,而不是首先从主题思想和教育意义来着眼。”〔4〕

随着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频繁批判,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学者开始把文学史规定格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无产阶级领导”和“社会主义因素”上,第二次文代会确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高准则,成为撰写

〔1〕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王瑶文集》第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551页。

〔2〕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第552页。

〔3〕《〈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纪录》,《文艺报》1952年第20期。

〔4〕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第558页。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尺度。这时的文学史被清晰地描述为社会主义因素在与资本主义因素的斗争中逐渐壮大的历史：丁易直接套用《新民主主义论》来定性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发展到现在，它的主潮一直是现实主义，并且是朝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发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运动的基本方向。”在此基础上，他精心建构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前进的过程中，逐渐发展，逐渐充实，逐渐壮大，并汇合了一些支流，而终于成为汪洋大海”的历史景观。^{〔1〕}刘绶松则把新文学定性为：“符合于中国人民的革命利益，反帝反封建的、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而且是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的文学。”^{〔2〕}并勾勒出三十年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萌芽、逐渐发展、迅速发展直到取得伟大胜利的发展轮廓。由于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和斗争性，丁、刘两著的“文学性”因素相对薄弱，他们挖空心思地寻找现代文学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以至有多处扭曲了作家作品的真相。^{〔3〕}

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学史，如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田仲济、孙昌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承受着50年代中期的影响，仍然在新民主主义论的范畴内述史。但这些文学史明显呼应着思想界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他们重提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意在纠正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史写作片面夸大社会主义因素，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偏差。田中济、孙昌熙曾明确提出：“决不能把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当成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也不能把中国现代文学史描述为仅仅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成长史和发展史。”^{〔4〕}这种变化，显示出革命意识形态对文学史写作的控制有所松动，现代文学史开始谨慎地向徐志摩、沈从文、卢隐、凌叔华、李金发、戴望舒等“资产阶级作家开放”，开放的理由则是文学的“审美性”。

〔1〕 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13页。

〔2〕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3〕 耀东、毅伯等人的《三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研究》1957年第2期）对丁易、张毕来的文学史缺乏文学性深表不满，他们认为刘绶松的《初稿》“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对人物形象的分析比较多一些”。

〔4〕 田中济、孙昌熙：《中国现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页。

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瑶率先反思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的狭隘性。他认为重提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使某些非左翼作家得到了正确的评价;但因为只强调政治思想这个侧面,从对新文学评价的视野来看,仍然比较狭窄,因此他明确提出用“文学现代化”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1〕}此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开始逐渐逸出新民主主义的框架。钱理群等人的《现代文学三十年》具有代表性,在描述现代文学的基本特质时,他们有意“突出了‘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这一主导的、整体性的文学观念,并且据此去进一步把握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它的历史优点,以及不可避免的局限”^{〔2〕}。以“改造民族灵魂”的标准建构文学史,这表明文学史家关注的焦点,开始由政治的层面向精神的文化的层面转移,其文学性因素也随之大大增强。王瑶在序言中认为:这部文学史“注意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与历史联系中去分析各种重要的文学现象,重视文学本身的规律和特点,重视作品的实际艺术成就,以及艺术个性与风格特点”^{〔3〕}。

我们不能忽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主体性大讨论对现代文学史观的深刻影响。这场讨论构成学界“重写文学史”的重要知识背景: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人的主体性与文学的主体性得到文学史家的高度重视。这时候产生的文学史论著,无论是以“改造民族灵魂”、“救亡压倒启蒙”,还是以“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作为建构新文学史的理论框架,都程度不同地体现出挣脱革命政治话语束缚,强化个人性和文学性的价值取向。而影响较大的“二十世纪文学”的倡导者们也认为:“‘二十世纪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4〕}提出“新文学整体观”的陈思和先生则说:以“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观编撰的现代文学史,“只是‘中国现代革命

〔1〕 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回顾与现状》,《王瑶文集》第5卷,第137页。

〔2〕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3〕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3页。

〔4〕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史’普及教育的一个方面,是论证新的政权的光荣历史及其合法地位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理想中的文学史是反对思想文化霸权的:“它不适合充当一部力图公正解释各种历史现象并负有意识形态指导者责任的教科书。”〔1〕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研究者们建构新文学史的标准逐渐多样化,而最有代表性的是审美现代性的、文化的、纯文学的和性别的标准。这些评价标准,都表现出明显的“非政治化”倾向。“主流意识形态”、“战争文化规范”、“一体化”、“宏大叙事”、“民间文化形态”、“多元化”、“日常叙事”、“女性主体性”、“性别意识”等概念,被广泛运用到文学史研究中,悄悄消解了既往文学史所建构起来的文学史秩序。在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后,文学史家们获得了心态自由,但其文学标准、文学史观却变得矛盾重重:因为种种“非意识形态化”的研究范式,是无法准确描述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而以主体性的理想标准建构新文学史,难免也会出现与新文学的客观发展历程不相吻合的状况。

面对这种现象,研究者们开始从当前现实和当前文学所引发的问题意识以及各自的研究对象出发,小心翼翼地寻找新的立足点,犹豫不决地去面对政治性与审美性这一难以打开的结:有的主张反思纯文学标准,重新召回文学史研究的政治维度,有的则担心文学史的研究会再度回到过去的“政治化”的老路上去。

二 意识形态与作家、作品的文学史定位

确定文学史的描述对象,对作家、作品进行文学史定位,这是文学史写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文学史观的变化,必然导致作家、作品评价的变化,以及作家与作家、作品与作品关系的重组。在几十年的现代文学史写作中,作家、作品的文学史定位的变化,深刻反映在几组相对立的文学现象的评价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及其对立面的林纾、学衡派、甲寅派,左翼文学及其对立面的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解放区文学与国统区(民族主

〔1〕 陈思和:《关于编写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几个问题》,《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9 页。

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前期延安文学与后期延安文学。这几个对立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历了一个“相对和平共处——尖锐斗争——再度和平共处(同时也产生新的偏差)”的变化过程,从中我们更能看出意识形态对文学史写作的制约。

“‘五四’是现代文学的源头,对源头的解析往往就是文学史观的定位。”〔1〕在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支配下,不同时期的文学史对新文学运动产生的原因、过程和性质的描述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前,文学史家对五四的阐释是较为自由的。譬如,任访秋侧重于从学术传承的角度追索五四新文学发生的原因;李何林在著史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还没有发表;三十年代的国统区文化界还普遍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启蒙运动,是资产阶级思想领导和以资产阶级思想为主的运动,看不出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2〕。所以他在当时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看成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在这种五四观的支配下,任著和李著在描述新文学革命时,均对胡适、周作人以较高的评价和较多的篇幅。

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特别是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五四领导思想的大讨论,文学史家(特别是强调“无产阶级领导”和“社会主义因素”的文学史家)对五四新文学的叙述便完全不同了:李何林率先检讨自己的五四观,他开始认为:“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在思想的‘量’上虽然好似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民主’占着优势,但是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的新兴无产阶级思想,在‘质’一方面实在起着领导的作用。”〔3〕王瑶也认可了无产阶级思想对五四领导作用,并认为这种领导作用“首先就表现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及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上面”〔4〕。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王瑶以较多的篇幅描述胡适、周作人的动摇性和妥协性。而刘绶松、丁易在描述新

〔1〕 温儒敏:《“苏联模式”与五十年代的文学史写作》,《文学史的视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李何林:《重版说明》,《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 李何林:《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性质和领导思想问题》,《光明日报》,1950年5月4日。

〔4〕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15页。

文学的发生原因时,则极力强化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在描述新文学产生的过程时,则抬高李大钊、鲁迅而贬低胡适、陈独秀、周作人。

改革开放初期,尽管许志英、朱德发等学者对传统的五四观进行过较为激烈的反思,但从总体上讲,当时的文学史家对五四的描述还是非常谨慎的:唐弢、田仲济、孙昌熙、黄修己等学者在描述五四新文学运动时,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表现出适度的宽容,并谨小慎微地对李、鲁、陈、胡、周的作用做出持平之论。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结构中,学界对五四新文学的描述则自由多了,在整体上摆脱了二元对立的倾向,表现出“多元互补”的态势,但同时也出现了刻意简化、颠覆五四新文学的倾向:有的研究者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无限制地抬高胡适、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的作用,而贬低李大钊、鲁迅、陈独秀的作用;有的学者站在文化保守主义或者后殖民主义的立场上,一味地肯定文化保守者传承民族文化的贡献,指责新文化的倡导者们为西方殖民话语所控制,切断了民族文化的命脉。

新中国成立前对作家作品的历史定位,尚未出现主流、支流、逆流的说法。如朱自清的《纲要》,并没有把“学衡派”与“自由人”看成新文学的“反动”力量,而是客观地指出他们在新文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和贡献。王瑶强调“反帝反封建”因素,其目的也是为了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家纳入文学史中,使其与左翼文学“共存互补”;正如他的批判者所指责的:王瑶妄图使“左翼文学可以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平共处,各在现代文学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和地位”〔1〕。相比之下,那些强调社会主义因素的史著,则存在较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在强调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作用时,极力强化两条路线的斗争。刘绶松强调文学史的战斗性,主张“划清敌我,分别主从”:对于“我”,“就要给他们以主要的地位和篇幅”;而对于敌,“要给他们的作品以无情地揭露和批判,指出他们思想的反动性,不把我们主要的篇幅花在他们身上”。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现代文学史被简化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发生发展史。从总体上来看,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作家作品定位,

〔1〕 中国人民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批判》,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6页。

主要是看其在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对作家的评价侧重于政治性的评价:学衡派被视为封建复古主义的,新月派是买办资产阶级的,后期京派是封建的和买办的,胡风的文艺观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修正主义文艺观。这些“逆流”最终被排挤出文学史。在新民主主义思想框架中确立的文学史秩序,程度不同地抬高了解放区文学(特别是后期解放区文学),贬低了国统区文学;抬高了左翼作家,贬低了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抬高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而贬低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学史,虽未放弃“敌—我—友”的模式,但从入史的作家作品来看,他们开始谨慎地向资产阶级作家作品开放,并适度抬高了非左翼作家的地位,向王瑶的“和平共处”方向回归。唐弢的三卷本文学史仍然坚持区分革命文学、进步文学、中间文学和反动文学,但从入史的作家来看已经比以前的文学史丰满了许多。黄修己在界定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时也主张:“‘现代’作为时间的概念,则凡在此时间之内,包括敌、我、友的文学,都应属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围。”〔1〕《现代文学三十年》则明显表现出由斗争向和平转变的迹象,不同倾向的作家在“改造国民灵魂”的目标上获得共同性与一致性:“过去我们比较重视与强调自由主义作家在文学与政治关系等问题上的分歧,这是必要的,但他们同是中国现代作家在重视文学思想启蒙作用等方面的共同性则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这就出现了偏颇。”〔2〕但考虑到文学史的“相对稳定性和可接受性”,该史著的基本框架仍延续前人所定,“未作根本性的变动”。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写作中,主流、支流与逆流的界限彻底消失,主流之外的文学现象则完全获得与“主流”文学和平共处的资格。但因为20世纪文学和政治无法拆解的关系,随着淡化政治所导致的价值判断变化,时常出现一些不符合文学史发展实际的判断,一厢情愿地使文学史上存在着尖锐冲突的文学现象握手言和。譬如,学衡派是否反对新文化运动,新月派以及40年代的自由主义作家是否反对革命文学,胡风是否反对毛泽

〔1〕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2〕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东文艺思想,这些本来无须论证的问题也都变得模糊起来。许多史论从文化的尺度出发,使学衡派得到了正面的评价;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使新月派获得正面的价值;从审美现代性出发,使沈从文、朱光潜得到很高的评价;从市民社会的角度出发,使通俗文学得到很高的评价。而五四激进主义者、左翼文学与解放区文学的权威地位,则受到严峻的挑战和质疑。这种文学史定位的变化,实际上是有其逻辑必然性的:进入后革命时代,知识分子的正义、良知、独立人格以及对文学的赤诚等精神性因素,成为文学史家关注的焦点(文化的、人性的和纯文学的尺度,均可视为偏重“精神”的价值取向),那些具有较强政治关怀的作家作品受到冷落,也是势所必然的。

钱钟书在批评五四后扬抒情抑载道的文学史时曾说:“作史者亦不得激于表微阐幽之一念,而轻重颠倒”,遮蔽文学史“承嬗之显迹”。〔1〕如果承认文学史应该是总体史,应该在政治、经济、伦理的变革中来把握文学的发展史,我们不得不说,在多元互补的价值取向下,文学史的写作出现了新的偏差:许多研究者在发现被过去文学史遮蔽了的作家、作品后,便急不可耐地把他们写入文学史,而忽略了对其进行思想史文学史的定位;这就使入史的作家、作品越来越多,文学史越写越厚,而文学史的“史迹”却越来越模糊。不同政治倾向的作家和平共处,使我们看不到文学创作随政治变迁而变迁的历史脉络,看不到近百年来重要政治事件对文学创作所施加的深刻影响。面对这种现象,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以往的文学史写作: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著,虽多政治偏见,但其辨轻重别主从的方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近年来许多文学史论著,在放弃新民主主义的标准时,也放弃了辨轻重别主从的方法,这是很难切近文学史的实际的:任何时代都有其主导价值取向和主导文学观念,片面抬高非主流的甚至潜在的文学写作,虽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学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如果因此而遮蔽那些处于显在位置并产生重大政治和历史影响的作家、作品,是不可能写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文学史的。

近些年来,许多研究者把目光转向左翼文学、延安文学以及十七年文学。有的肯定左翼文学关注民众和底层生活的传统以及其中体现的反抗精

〔1〕 钱钟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钱钟书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3页。

神,孟繁华认为:“左翼文学的先锋性和它的民众性,是它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领导中国文学潮流的内在原因。”面对当前生活和当前文学的现状,“我对左翼文学充满了憧憬和怀念。怀念左翼文学,不止是要呼唤它的革命精神,而更多的是刚才说过的左翼文学的丰富性”。〔1〕张梦阳甚至主张:“高举左翼文学的旗帜,为社会正义而斗争。”〔2〕而接下来的某些“底层文学”的倡导者们,则主张从“左翼文学”传统中汲取理论资源,延续和复活中断了多年的“左翼文学”脉流。这种重评工作,一方面可以看成对当前社会问题的积极回应,另一方面也未尝不可看成对过去“为被压抑者翻案”的研究范式的质疑。

三 意识形态与文学史料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撰写史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文学史料的发掘、整理以及阅读方式与意识形态转换的内在关联。首先,意识形态制约着史料的发掘方向,研究者在突出某些史料时,常常会有意无意地遮蔽另一些史料。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史料的取舍是服从于两条路线斗争需要的,这使得许多有价值的史料被淹没,如学衡派、新月派以及后期京派的大量史料长期不能公开出版。许多作家为适应意识形态的需要,对原作进行大量的修改,导致史料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使版本汇校、对校成为当前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项重任。后来,由于左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减弱,过去许多被遮蔽的史料才逐渐出版;这些史料的公开,对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史观念造成严峻的挑战,同时又导致某些新的遮蔽,使革命文学的史料成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对比在左的意识形态控制下所撰写的文学史与近年来所出版的文学史,可以鲜明地看出这一点。其次,意识形态制约着史料的阅读方式,常常导致对史料的误读。这正如两人吵架,当事人对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利益有用的

〔1〕 孟繁华:《左翼文学与当下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

〔2〕 张梦阳:《左翼文学资源与当代中国的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